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

# 形而上学及其任务

——关于知识的范畴基础研究

〔美〕格拉切 著

陶秀璈 朱红 杨东东 译      傅永军 校

*Metaphysics and its Task*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

# 形而上学及其任务

——关于知识的范畴基础研究

〔美〕格拉切 著

陶秀璈 朱红 杨东东 译      傅永军 校

*Metaphysics and its Task*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及其任务/(美)格拉切著;陶秀璈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09-04681-7

I. 形... II. ①格... ②陶... III. 形而上学-研究 IV. 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446 号

责任编辑:隋小山

装帧设计:周云龙

## 形而上学及其任务

(美)格拉切 著 陶秀璈等 译

---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32 开 (145mm×210mm)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字 插页 2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681-7

定 价 25.00 元

---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633)8221365

## 荷海·格拉切哲学简介

我非常高兴看到我的朋友与同事荷海·格拉切（Jorge Gracia）的第一本被译为中文的哲学著作。荷海·格拉切是近几十年美国哲学中极其活跃，富有贡献的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形而上学，中世纪哲学，哲学解释学及拉美哲学等领域，出版了十五部广有影响的专著，主编了近二十部著作。他还积极从事哲学的行政及组织活动。除担任过多届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外，他曾任美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学会主席，拉美思想学会主席，美国天主教哲学学会主席，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主席等。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形而上学及其任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分析形而上学这一学科性质的专著。从亚里士多德以降，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范围与界限，形而上学的合理合法性等后形而上学问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至今未有共识。格拉切在本书中力图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形而上学能够从对它的种种攻击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发展？他对哲学史上提出的种种有关形而上学性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讨论和批判，并建立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概念，即形而上学是对一切知识基础的范畴性研究。形而上学寻求辨认与定义最为一般的范畴，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一般性程度较低的范畴与最一般的范畴相联系的方式。按照格拉切

的看法，正是因为形而上学是研究其它学科的基本概念，使得一切知识皆依赖于形而上学观点，形而上学才变得始终不可避免。而那些力图拒斥或取消形而上学的努力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由于把形而上学定义为对范畴的研究，格拉切在本书中亦对范畴的性质及本体论地位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此书已在美国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纽约的 Randolpi 出版社于 2006 年初出版了《我们如何理解格拉切的观点?》一书对此做专门研究。十多位哲学家对格拉切在《形而上学及其任务》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批评性考察。

形而上学一直是格拉切哲学生涯的兴趣中心。他于 1971 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中世纪哲学家苏亚雷兹的形而上学。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个体性及个体化的研究。继一系列哲学史研究专著后，他在 1988 年出版了《个体性：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一关于个体性的系统研究专著。该著作于 1992 年获美国形而上学学会颁发的形而上学奖，成为格拉切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常区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但这一区分在格拉切身上很难适用。他是中世纪哲学训练出身，可常常从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中引发出哲学问题，并将之与现代哲学的讨论相连进行系统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常常是通过对历史上著名哲学家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而进行的。格拉切从自己的哲学实践中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进行反思，从而进入哲学史学的研究。1992 年他出版了一部大著《哲学与其历史》。该书探讨了哲学与其历史的关系，历史叙述中价值判断的作用，哲学史对哲学的价值，文本及对它们的解释在哲学史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他主张哲学史必须以一种哲学方法去研究，即哲学史研究不应只是描绘与解释，而必须有价值判断，对历史上的命题与问题做哲学研究。格拉切还希望通过对哲学史及哲学史学的研究找到一条将

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相连的通道。该书出版后，美国哲学大会东部分会对此进行了专场讨论。

由于我们从过去获得的乃是文本，故而继《哲学及其历史》之后，格拉切开始思考关于文本的问题，即什么是文本？文本的认同条件是什么？文本与作者的联系为何？作者自己解释的可能性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导致了以下两部专著的出版：《文本性理论：逻辑与知识论》（1995）及《文本：本体地位，认同，作者及读者》（1996）。它们填补了对文本性研究的空白。

将对文本与解释的研究与他的中世纪哲学专长相结合，格拉切将研究扩展至神学解释学。2001年他出版了《我们如何知道上帝的意思？》，对解释宗教启示性文本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进行哲学考察，阐发了神学解释的逻辑可能性与相对性。这一研究将现代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的根源相联系，因为解释学正是起源于对犹太—基督经典的解释。2003年格拉切应邀在马凯大学作托马斯·阿奎那演讲，演讲稿以《旧瓶新酒：传统在交流，知识及群体认同中的作用》为题出版。在这一著作中，格拉切进展到对传统的解释，以传统来说明对知识，记忆及族群认同的保持与传承。

格拉切的另一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域是对拉美哲学及由此引发的对族群与种族的哲学研究。西裔现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对其文化，思想，认同等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已成为美国哲学界不可避免的问题。格拉切作为一名古巴难民的后代成了这一新领域的领军人物。2000年他出版了《西裔及拉美裔认同：哲学视角》一书，从多学科角度第一次对该问题及族群性概念进行了系统考察。2005年他又出版了《种族，族群及民族性考察》一书。经过他的努力，拉美哲学在美国哲学界逐渐有了一席之地，而与此相关的种族与族群问题也不再是非裔研究的专利。格拉切对拉美哲学的兴趣不只是因为他自己是一名西

裔，也不只因为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问题，他的兴趣主要是哲学上的。格拉切确信，从西裔的语言文化背景出发去思考哲学问题可以为美国主流哲学界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批评性考察的平台。同时，拉美哲学也不应当继续是欧美哲学的殖民地，而应从自身的环境、传统和形式出发开辟新的领域。出于这一信念，他做了许多努力促进拉美哲学与英美哲学的对话。在这方面，格拉切的工作应当值得华裔哲学家们借鉴。

荷海·格拉切已近古稀之年了，但支配其哲学生涯的对理解的渴求却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作为知名哲学家，他的日程一直很忙，有无数的演讲和会议邀请，可他仍能找到时间不停地写作和出版，其过人的精力与无以比拟的效率常令我羡慕不已。从1997年到布法罗工作至今，我一直从与他的经常性哲学对话中获益匪浅。我们一起合作组织了两次国际会议并主编了两部著作，一是《理性与幸福：从古代到中世纪》，另一是《对哲学经典的使用与滥用：西方对古希腊哲学的解释》。我的书稿及多数文章他都阅读过初稿并作出详细的评论。我一直为有这样的同事和朋友而自豪及庆幸。

2002年秋季《美国哲学学会会报》对格拉切进行了一次长长的采访。在快结束时，采访者（一名年轻的西裔哲学家）希望格拉切对青年哲学家提供一些忠告。率直的荷海提出了五点意见：1. 忠于我们的学科的名字：爱智慧。2. 别忘记你的根。哲学思考不能脱离哲学家自身的经验及智慧传统。3. 不为负面的批评而沮丧，而应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东西。4. 不要让他人的评论左右你自己的立场。5. 不要把名利作为目标，真正的目标应是理解，求知。名利是他人给予的，是条件性的，而理解则在自己掌握之中。我一直觉得这些平实的忠告很有用，很乐意就此次机会与我在国内的哲学同仁，尤其是青年同道们分享。

## 中文版序言

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中国是仅有的其文明绵延了数千年的国度。大多数过去的文明都在其历史的某一阶段达到终点，今日只有残垣断壁可寻。为雅典人所熟悉的伟大的古希腊文明已经终止，在泛希腊化及拜占庭时代演变成极其不同的形态。随后它与其他文明相混合，发生实质性的转换，以至于在后来这些发展中很难认清其原来的成分。古希腊人对理性的敬仰被放弃，而代之以宗教的狂热或独断论。埃及的历史悠久的重要文明亦被罗马帝国的暴政、希腊主义的力量及穆斯林的主宰性影响所淹没。今日埃及与法老时代的埃及已截然不同。我们只有在其遗留物及考古碑铭中去见识它辉煌但已经死去的过去。美洲的伟大文明——玛雅，因卡及阿兹台克都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消失了。时至今日，就如同在埃及和希腊一样，我们只能在墨西哥与秘鲁这样的地方见到那些曾经是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的遗骸。

但中国则不同。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变化与动荡一直未断，当今中国亦非是其两千年前的样子。意识形态曾经经历过重大变化。20 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思维转换。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中国文明与过去的连续性是显著的。这有多种原因，中国领土的相对完整无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诸如书写语言这样一些可将文化统一的现

象。特别有意义的是政治上的延续性。尽管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政治系统，但作为一个国家，它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长久。无疑，这就使其文化发展具有某种在其任何其他地方都见不到的一致性与整合性。由此可引发对贯穿于其中的概念结构与模型的研究。

就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研究而言，哲学是一个重要和有效的切入点。因为在所有人类事业中，它是最具自我反省力的。哲学家力图进入人类、社会及世界的本性深处，以揭示塑铸它们的根本性力量。那么中国哲学又揭示了什么呢？

中国思想着重伦理与政治，这已是老生常谈。儒学比其他任何思想都更深远地铸造了中国文化。而儒学远比其他文化更有效地使日常生活、生活必需及群体共存成为焦点。此外，学者们也提到贯穿于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方面。

如果这些是真实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与文化和通常认为的西方哲学主流便十分不同。西方哲学较少关注生活与社群这样的实践方面，而更侧重于理论的及思辨的问题。西方哲学的核心在于形而上学，知识论及逻辑学这些分支。伦理学与政治学虽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但一般总被认为是次要方面。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在相当程度上是根据他们对形而上学、知识论及逻辑学这三个领域的贡献而衡量。这倒不是由于他们未探索其他领域或其他观点不甚重要。举例说，当我们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他们的政治与伦理思想无疑是极重要的。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及逻辑学仍被认为是他们最骄人的成就。这些成就为西方思想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方哲学一直有着重要的宗教情怀。这似乎亦与中国哲学的对人文主义的专注形成对照。漫长的中世纪主要是对信仰感兴趣。中世纪作者思考的主要问题是神的性质及他对人的启示，

以及将启示与科学发现相协调的各种途径。从公元 400 年到 1500 年，这些话题构成了思辨的主题。而这种趋势强化了那种已经确立起来的、并成为西方思想特征的对形而上学、知识论及逻辑学的兴趣。

由此看来，两种不同文化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在这些不同的哲学观与兴趣之间能架起桥梁吗？如果中国与西方之间如此不同，它们的哲学重点如此迥异，还有交流以至调和的可能性吗？更为具体地说，一本在西方写就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书能对中国起什么影响？

当然，我们可以以消极的口吻说不感兴趣，但如果能够对此问题做积极的回应，那儿它将引导我们做出更为深刻的哲学反思打开交流平台。有两个问题最有意义。一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可能性，另一是不同文化能互相补充互相帮助的途径。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在《旧瓶新酒传统在交流、知识及群体认同中的作用》（2003）这本书中作了讨论。而第二个问题则可以从我在《形而上学及其任务》中有关形而上学性质的某些论点出发进行讨论。但首先让我就有效交流的问题再说几句话。

人们通常将一系列文化实践传统看做是有效交流的基础。交流问题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当我们力图通过语言交流时，我们似乎被困于文本之中，未能突破它们而把握意义。只要我们力图通过语言解释文本的意义，则分析依然是文本性的。可构成文本的符号是多义的，不可能将其意义固定，所以很难知道对话者是否在理解同一件事，即使他们在使用同样的词。

为了突破这一怪圈，我们必须移离语言，引入预期行为这一概念。我们知道我们能互相理解，因为我们可以以预期的方式互相回应。不可预期行为自身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另外的东西来确认那一行为是可被预期的。这东西不可能是文本，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了语言的怪圈。缺失的因素是传统，不过

不是语言意义上的传统。当传统不被理解成是文本的，而被设想成是缺乏语义意义的若干不断重复的行为的种类时，它就可以真正地帮助我们解释我们如何能交流的问题。传统能提供一张可预期行为的地图，而这对于我们知道我们能互相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请饭店服务员为我送上饺子，而他在告诉我该饭店有饺子并为我送上桌子时，我就可以确信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如果他给我送来别的东西，那我就明白他没懂我的意思。

可这就足以回答 W·V 奎因了吗？奎因认为使用相同的词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确实有相同的理解。当我看见一只兔子，而一位不说英语的部落成员指着兔子说“Gavaga”时，我不知道他是在和我一样想着兔子，还是很不相同的东西。

当我们只是在处理单一字例时，奎因是对的。事实上，奎因的论证表明了对传统作非文本性理解的必要。传统并不只是与孤立的词汇相关。传统是复杂的，具有背景的，并且不断重复的。除非一个人理解文化——即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们的生活方式——她是不可能理解一种语言的。传统构成了文化的主干，是编织文化网络的丝线。一旦我们把传统考虑进去，奎因提出的问题就消失了。如果一个探索者在一个部落住上二十年，领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当他们说“Gavaga”时，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当然，有人可以回答说，这仍没有解决交流的问题，因为我只是明白了他在说什么，却并没有明白他的思想。这一答复并不那么有理。如果一个人认为传统是行为，那么由此可引导到接受下面的立场：尽管我们没有明白某些行为——例如我不明白你在思想 P 命题这样的行为——但有些行为我们是明白的。由于我明白的行为与我所不明白的都是同一构架（即生活方式）的部分，我们对某些功能的知识可作为其他知识的钥匙。把传统只是当做一系列信念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我们困于文本之中

不能自拔，无法在它们与理解的行为之间搭架桥梁。但如果把传统看做行为，文本便成了在一个行为间互相紧密联结的框架中的某些行为的表述，而许多这类行为我们是明白的。

以上观点旨在说明，中国与西方之间交流的关键是深入到每一文化的文化实践之中。只讨论语词是不够的，必须明白两种文化中的人民的生活方式，必须学会如何在一起生活。这是我对交流的意见。现在让我转向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与西方文化间互相补充互相帮助的方式。

为阐明这一问题，我需要诉诸《形而上学及其任务》中的一个主要命题，即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全部思想和行为都依赖于某些观点，而这些观点使用那些接近于日常生活的概念。我们谈论桌子和椅子，米饭和饺子。但这多种多样的概念自身又集成更为一般的概念，并以类的等级一直往上，直至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一般的概念。这些最一般的概念隐在其他概念中。我们集合与分离这些概念的方式在相当的意义上隐含在我们所思所行之中，即使我们并不使这些概念及它们间的关系变得明确。特殊的学科研究较少普遍性的概念。例如，心理学研究人体构成及各种精神现象。人体解剖学研究人体构成及其各个部分。医学研究人体的功能以及如何预防疾病，等等。但有一门学科研究最普遍的范畴，这便是形而上学。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对于形成宇宙的总的看法以及我们对它的经验是必要的。因为这一领域为其他领域提供了概念构架并对之作出思考。形而上学对于批判性地研究我们划分概念的方式是否合适和一致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让我回到中国哲学。上面提到一个传统的看法，即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之处在于中国哲学注重实践性的伦理与政治问题，而西方哲学则更关注理论与思辨。这意味着中国哲学相较于西方哲学而言，较少关注形而上学。如果事实如此，

那么这便是西方哲学及这本书可以起作用的地方。它可以让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领域更为看重。当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如果代表中国哲学的书籍能在西方流行，更清楚地揭示中国人对生活与世界的看法，则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会有特别的用处。

《形而上学及其任务》主要是一部关于形而上学的著作。它对形而上学的性质提出了一种看法并力图说明在对世界的一般性的哲学观点的发展中形而上学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这一著作自身亦具有形而上学的一面。其主要命题之一是说形而上学是研究范畴的，并进一步论证说范畴在本体论上是中立的。也就是说，范畴作为范畴对于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或对于它是作为概念还是作为精神外的东西而存在是中立的。这种中立性的优点在于，它不会使人们在研究形而上学究竟是在做什么的这一问题之前便已对答案做出了倾向性的选择。范畴性质本身即是一形而上学主题。

我希望这些讨论对中国读者是有用的。我尤其希望它能促动读者去重新考察他们关于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重新思考形而上学在人类知识，特别是哲学中的地位。希望读者们能理解，所有的知识、包括生活中的最具实践性质的知识，都是建立在概念框架之上的，而研究概念框架，则是形而上学的任务。我也希望这只是讨论的开端，而不是终结。因为哲学起源于惊异，只有在困惑中才能取得进步。

最后，让我感谢傅永军教授在出版本书中文版方面所作的努力，感谢陶秀璈教授翻译此书，感谢我的同事余纪元教授把我的工作介绍给中国。我希望他们的努力也能够为读者所赞赏。

荷海·格拉切

## 前言

形而上学能够持续不断地恢复其特有的活力，这或许是哲学史上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之一。的确，从一开始，形而上学就一直受到攻击，它有好几次看来都好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这门学科却总是能设法恢复自身。

这些反形而上学的攻击具有不同的动机。大体上一些人是受反对知识的怀疑论观点的影响。这种攻击首先出现在古希腊，当智者否认知识的确定性、而喜好权宜之术时，就已显露了出来。他们反对的矛头还不是专门指向形而上学，而是指向任何获得确定知识的可能性，因为当时形而上学还没有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像高尔吉亚这样的怀疑论者，由于他对我们理解和探寻的真实基础表示了怀疑，从而削弱了对发展后来以形而上学而著称的这门学科的任何企图。

怀疑论者的这种攻击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苏格拉底已经从智者学派中脱颖而出。他明确地承认他的无知，从而为对整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形而上学学说之一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奠定了基础。的确，恰恰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地尝试将形而上学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并且正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罗兹的安德罗尼柯将“形而上学”这个专门术语赋予该学科。

中世纪对形而上学的攻击则出自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中

世纪的拉丁学者最关注的是人类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以及哪个时代会是上帝向人们启示他对人类的拯救计划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中，任何以人类自然力为唯一基础的事业，对于那个时代的基本目的而言，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被看做是次要的。事实上，所有哲学和非宗教的知识，包括形而上学，都被看做是可疑的，因为它们的观点似乎与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的观点相抵触。这种与整个世俗化研究的对立，在这个时代的各个时期，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例如，彼得·戴米安就被指控为杜撰语法的恶魔，因为语法使天主这个词变格为复数成为可能。另一种攻击比起这个来，没有那么荒谬，但也正是因此，它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化知识和在特殊意义上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将来，更具有危险性。这种由伯纳文特提出的周密的、理由充分的论据，反对所有除了上帝的启示之外的知识，并且企图将所有学科都还原为神学，从而严重地威胁了形而上学的独立性。同样可以说，中世纪后期的作者强调的是信仰的可靠性和理性的不可靠性。

无论如何，这种反形而上学的宗教式的攻击是不成功的。异端在等级森严的宗教思想家内部出现了。如托马斯·阿奎那和约翰·邓斯·司各脱，他们不仅维护了形而上学和广泛地记写下了形而上学的性质与形而上学的论题，并且发展了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几乎影响了未来几代的哲学家，并且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产生了唯一能看做是这门学科的复兴的内容。

在现代早期，经验主义的发展对形而上学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挑战。如果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并且如果形而上学，正如很多人所宣称的那样，既涉及非物质的存在体，并且是先天地进行规定的，那么形而上学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知识。例如休谟的纲领，认为必须摧毁形而上学，如果不这样的话，至少有实质的改变。

但是休谟的观点却导致了康德的出现，后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针对经验主义的挑战，他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即要为形而上学找到一块地盘，发现可构成我们知识的必要条件的概念结构。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形而上学又重新复活了，就像凤凰涅槃一般，尽管是以新的形式。的确，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造就了西方形而上学研究的最旺盛的时代。

19 世纪见证了对形而上学的另外一种挑战，这是由自然科学的成长和成功引发的。19 世纪的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作为例证，并且因此将建立在另外的不同方法基础上的结论推翻。由于很多后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们不受观察的约束而沉溺于思辨之中，他们的观点必定被实证主义者作为一种非科学的、因而是非真实的知识而摒弃。此外，实证主义者还有其实践的一面。他们不仅限于理论研究还希望对社会的进步有所促动。他们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由于它的纯粹理论目标和它的思辨的方法，所以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实证主义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因为它诉诸了实践的需要和要求。

然而，对这种反形而上学浪潮的反叛没有多久就出现了。19 世纪实证主义之所以让位，是由于他们清除了伦理和美学的价值。在他们将所有学说都还原为科学学说的企图中，他们把伦理学和美学还原为经验的心理科学，从而在他们的模式中，没有为人类自由和自我留下位置。甚至一些向来具有实证主义修养的人都发现了这种态度的不适当性，转而起来反对它。其结果是形而上学的回归，这是一种关于生活、人性和价值的形而上学。

对形而上学最近的一种批评，是建立在确定的语义学理论基础上的。意义和真值条件之间的强大关联，作为弗雷格和其他学者的一些重要——有些人称之为革命性的——结论，在 20

世纪被建立起来。这种理论，连同一种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为意义的可证实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种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且获得广泛普及的理论认为，意义以经验证实为必要条件，以至于任何不被经验证实的语句一定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种观点起到了毁坏形而上学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形而上学语句都不能在经验的语词中得到证实。按照这个判别标准，形而上学语句便是没有意义的，并且因此，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合法的学科必须被抛弃。

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攻击，在英—美哲学传统的国家有强大的影响。尽管认为意义是可证实的这样一种观点很快受到了挑战，并且最终被代表英—美哲学主流的大多数人所抛弃，但是，从语义学角度展开的批判，即将形而上学看做是虚伪学科的观点，却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将形而上学带回到英—美传统国家的第一个重要尝试，是由 P. F. 斯特劳森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创的。斯特劳森论证说，有两种形而上学，一种是合理、合法的，一种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他称后一种为“修正的”，因为它旨在改变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正如他所指出的：“创造一个有关世界的更好的〔我们思想的〕结构。”“描述形而上学”则相反，它“满足于描述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现实结构”<sup>①</sup>。修正形而上学的代表是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巴克莱；描述形而上学的代表则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观点与他的前辈相比，有相当的不同，而是否赞同或者反对其中的观点，是分析哲学传统的学者们迈向合法的形而上学实践的意义重大的第一步。的确，在最近这些年，形而上学已经成为分析哲学家的一种正当的追求，尽管他们通常是通过语言学和语义学的观点来对待它的。形而上

---

<sup>①</sup> 斯特劳森：《个别物》，p. 9。